

·弗莫尔游记·

# 破碎的道路

从铁门峡谷到阿托斯圣山

[英] 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 著

[英] 科林·杜勃朗 阿尔忒弥斯·库珀 编

— 熙 译

THE BROKEN ROAD

Patrick Leigh Fermor

Colin Thubron · Artemis Cooper

二十世纪英国知名游记作家徒步欧洲的社会感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动荡前夜的欧洲《文化苦旅》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弗莫尔游记·

# 破碎的道路

从铁门峡谷到阿托斯圣山

[英] 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 著

[英] 科林·杜勃朗 [英] 阿尔忒弥斯·库珀 编

— 熙 译

THE BROKEN ROAD

Patrick Leigh Fermor

Colin Thubron Artemis Cooper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碎的道路 / (英) 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  
(Patrick Leigh Fermor) 著; (英) 科林·杜勃朗  
(Colin Thubron), (英) 阿尔忒弥斯·库珀  
(Artemis Cooper) 编; 一熙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  
版社, 2016.9  
(弗莫尔游记)  
书名原文: THE BROKEN ROAD: From the Iron Gates  
to Mount Athos  
ISBN 978-7-5689-0018-8

I. ①破… II. ①帕… ②科… ③阿… ④一…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01318号

## 破碎的道路

Posui De Daolu

[英] 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 (Patrick Leigh Fermor) 著  
[英] 科林·杜勃朗 (Colin Thubron)  
[英] 阿尔忒弥斯·库珀 (Artemis Cooper) 编  
一熙译

策划编辑: 王 斌  
责任编辑: 张家钧  
责任校对: 邹 忌  
责任印制: 赵 晟  
版式设计: 张 晗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mm×102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26千 插页: 16开2页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018-8 定价: 39.0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目 录



1. 从“铁门”出发 .....	001
2. 悬空的玻璃房 .....	018
3. 穿越巴尔干 .....	038
4. 多瑙河畔 .....	080
5. 瓦拉几亚平原 .....	115
6. 布加勒斯特 .....	130
7. 瓦尔纳 .....	167
8. 黑海岸边的舞蹈 .....	189
9. 君士坦丁堡 .....	219
10. 阿托斯圣山 .....	223
致谢 .....	290

## 1. 从“铁门”出发

罗马尼亚，奥尔绍瓦镇。我再次与多瑙河相遇。此时，河面宽度将近一英里，但不知怎么的，忽然拐了个弯，向西流去，劈开喀山的深幽峡谷，河面也骤然收缩，只剩下不到一百六十二英尺。自从和我在布达佩斯分道扬镳，这条河沿途先后汇合了萨瓦河、德拉瓦河、毛洛什河、摩拉瓦河，以及其余十多条不知名的支流。从奥尔绍瓦出发，顺流而下，没过多久就到了位于河中央的阿达卡勒夫小岛。岛上长满了白杨和桑树，木制的房檐之间耸立着教堂的圆顶和尖塔。街上行人来来往往，都穿着土耳其风格的服装。这是因为岛上居民大多数是土耳其人，他们构成了除土著之外，中欧地区唯一的土耳其人聚居区。伴随维也纳战役的失利，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已日益衰微。站在岛上，河对岸低矮陡峭的小山尽收眼底，那里是南斯拉夫的地界。

第二天一早，我在留存邮局收到一封从布达佩斯寄来的信<sup>[1]</sup>——一路上，我一有机会就写信，凑成厚厚的一叠，便寻找机会塞进路边简陋的邮筒里，就在德瓦火车站与朋友挥手告别的当口，还寄走了好几封。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爬上多瑙河上的汽轮。随着机器的轰鸣，船速越来越快，城市被远远抛在身后。很快，汽轮

---

[1] 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盼望着齐妮亚·色诺维茨（“安吉拉”）的来信，对方是匈牙利人，《山林与水泽之间》一书描写了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钻进了峭壁林立的峡谷，蜿蜒着朝“铁门”开去。湍急的河水拍打着两岸，水声、汽笛声连成一片。又走了几英里，山势渐渐平缓，河面也恢复了往常的宽度。在罗马尼亚一侧的河岸上，耸立着高大的塞维林堡，公元一七二和一七三年，罗马皇帝曾率兵在这里击败夸迪人与马克曼尼人。平坦的奥尔特尼亚平原上，芦苇迎风飘扬，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似乎还在哀悼战场上的亡灵。左侧的河岸上绵延着塞尔维亚的群山，那里是巴尔干山脉的起点。河水在山间回环往复，突然间，南斯拉夫的山峦延伸到了保加利亚境内。巨大的木筏漂浮在水面上，装载着货物的驳船首尾相连，足足有一英里长。记得在奥尔绍瓦，看到自己护照被盖上“八月十四日”的日期戳，心里既惊讶又兴奋，不知不觉间，我在特兰西瓦尼亚已经待了三个多月。终于又踏上新的旅途，我决定把出发前收到的信再重温一遍。

不过，我的心绪很快就被出现在多瑙河南岸的城墙和城堡打乱了。这里是保加利亚的维丁镇，一个古老的要塞。闹喳喳的男孩子涌上栈桥，兜售手里的西瓜。我挑了一个西瓜，摸了摸口袋，又尴尬地还给卖主，因为身上只剩下两英镑和一把罗马尼亚硬币。同行的一位身材高挑、一头直发的英国姑娘，慷慨地给了我几枚保加利亚硬币。我们将西瓜一分两半，碧绿的瓜皮、鲜红的瓜瓤、黝黑的瓜籽，看上去就让人口齿生津。

经过好几个月语言不通的日子，突然有人跟我用英语交谈，真是件让人兴奋的事儿。她叫瑞秋·弗洛伊德，正打算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她读牛津大学时的朋友，现在是驻索非亚的英国领事的夫人。一路上，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起各自的见闻。下午，汽船到达帕卡拉，我们下了船，挥手告别，约定在索非亚见面。她继续

乘火车出发，而我将探寻保加利亚之行的第一座城市。

纵贯中欧，从漫天飞雪的莱茵河，穿越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跨过古老的波西米亚与匈牙利帝国，直到被密林掩映的特兰西瓦尼亚，神圣罗马帝国的遗韵、查理曼大帝的功绩，以及基督教世界的隐秘，似乎还萦绕在空气中挥之不去。土耳其人对东欧的占领早已结束，时至今日，连遗迹都难以寻觅。不过，位于多瑙河南岸的连绵群山，似乎还臣服于原来的主人。直到最近，土耳其对保加利亚的影响才慢慢削弱，但在托罗斯山脉、阿拉伯的沙漠和亚洲的高原，土耳其文化仍大行其道。过去数百年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文明如汹涌的海潮，席卷了东西方，随后风浪渐平，取而代之的是斯拉夫-拜占庭文明。不同文明的冲撞，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教堂的圆顶和尖塔、街头的烤肉串、木结构的房舍、拜占庭式建筑、黑色圆柱形帽子、修士的长袍、留着长发和大胡子的神甫。还有店铺招牌上的古斯拉夫语字母，让人以为来到了俄国。壮实、直率的保加利亚人喜欢跟人分享自己悠久的民族发展史，那时他们住在伏尔加河以外的荒野，数个世纪之前才来到此地定居。作为游牧部落的后代，他们继承了先辈粗犷豪放的性格，而且跟罗马尼亚人一样，脚上穿着牛皮做成的鞋子，像强壮的黑熊一样在卵石路上蹒跚而行；手工制成的衣服又厚又结实，颜色多为深蓝或棕色，某些地方还用黑线织出刺绣的花纹；肥大宽松的裤子，前襟交叉的背心，短外套，一英尺宽的猩红色腰带上常常插着用来防身的匕首。他们还戴着和哥萨克人一样的棕色或黑色的鹿皮帽子。

我来到小广场上的露天餐馆，要了泛着油花的炖羊肉、土豆、西红柿、豆荚、绿皮小黄瓜和秋葵，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都盛

在巨大的铜锅里。我注意到隔壁桌的两个年轻人左手小拇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这说明他们的身份并非是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夫。三位留着白胡子、脚穿鹿皮软鞋的老人默默地坐在一旁，抽着琥珀烟嘴的水烟袋，嘴里不时吐出白色的烟雾。他们手里悠闲地拨弄着用琥珀做成的念珠，珠子相互敲击，发出有节奏的、清脆的声响，好像是在计算与回味过去的人生。一群军官，身穿白色的上装，扣子像俄罗斯人一样扣在左耳下方，金色的肩章，黑红相间的条纹，俄罗斯样式的帽子，长软靴子。他们边抽烟边聊天，有时还踱到树下，腰间的佩剑来回晃荡。奇怪的是，这里看不到一个女人。狗儿趴在地上啃着羊骨头，砍下来的羊头排列在肉铺门口的案板上，眼神空洞地瞅着上门的买主。从羊肚子里掏出来的羊肝、羊肺还挂着血滴，羊肠盘在铁钩上，像一朵苍白的垂花。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了乐声，和着带有东方色彩的歌谣，哀怨的曲调让人黯然神伤。茉莉花的清香弥漫在空气里，耳畔传来蚊子的嗡嗡声。

这真是个悲伤的时刻。与昔日的繁华相比，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一路向南，走过地势起伏的多瑙河山地和平原。这里草木苍翠，成片的水泽绿意盎然，道路两旁长满了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常见的白杨。阔步走过蜿蜒了约二十一英里的水滨路，我终于爬上了巴尔干山脉。在保加利亚语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这段山脉被称为斯塔拉山脉，意思是“老山山脉”。山势腾挪跌宕，从保加利亚北部一直延伸至塞尔维亚和黑海。山体像狮子高耸的脊背，线条刚健，几乎找不到豁口和裂缝。沿着北风呼啸的开阔地，我像爬楼梯一样，一级一级地登上高处，又下到像巨大盆地一样的峡谷里，灰白色的路面向远处延伸开来，绕过突兀的小山包，穿越放牧的羊群，最后消失在卡其色的山坡顶上。有时我会遇上商队，成群结队



## 1. 从“铁门”出发

的驴子和骡子拉着马车朝哈斯科沃行进，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因为在很多地方，骆驼已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如果货物比较轻，一般用马来拉，商队里的马个子小、性子倔，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果拉的是木材类的重物，黑色的水牛就该登场了，它们脖子上套着沉重的轭架，眼珠子瞪得老大，牛角伴随着沉重的脚步悠悠晃动。木制的马鞍两旁悬挂着鹿皮褙褙，看上去像一乘华美而笨拙的象轿。西瓜是最主要的货物，另外还有大筐的西红柿、黄瓜和其他瓜果，要知道在整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人是最称职的农夫。每个村子的四周都种着蔬菜瓜果，他们还用中空的树干搭起小型的沟渠，把每一滴宝贵的水都用于灌溉。“打哪儿来呀？”戴着皮帽子、两手枯瘦的男人问道。“亚洲？欧洲？”“欧洲来的。”“德国人？”“不，不是德国人。”“英国人。”大部分人弄不清英国在哪里。我是干什么的？小提琴手？士兵？学生？间谍？我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回答他们抛出的疑问，连说带比划：面包、水、酒、马、猫、狗、羊奶酪、黄瓜、教堂。靠着原始的交流方式，我们一路同行。

头一天晚上，我借宿在谷仓旁边。接下来两天，我先后到了费迪兰德和博科维查，每晚都饱受蚊虫的滋扰。到第四天晚上，我们已经翻越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座分水岭，在一棵悬铃树旁与前往索非亚的商队会合。树下有一泓清泉，甘冽的泉水从石板围成的出水口喷涌而出，装满了整个水槽。石板上刻着弯弯曲曲的阿拉伯字母，据说是一篇纪念死去的帕夏<sup>[2]</sup>的悼文。我们和牧羊人围坐在篝火旁，圆形的木制酒瓶从一人的手中递给另一个人，有人吹起三英尺长的排箫，有人奏响风笛。风笛的制作方法很奇特，得先将剥好的羊皮做成气囊，接上木质的吹口，笛管用牛角做成，管身用烧红的

[2] 通常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高级官员的称呼。

烤肉叉子钻出小洞。他们最喜欢唱的是纪念哈吉·迪米塔的歌曲，来自斯利文的迪米塔是保加利亚的民族英雄，俄土战争中，他率领一支游击队在希普卡隘口英勇抗击敌军。夜已深，人们还盘腿聚在一起，鞋袜与羊皮帽放在身旁，火光映红了微醺的脸庞。五彩的饰带，轮流值夜的牲畜，间或传来的铃铛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浩瀚星河、神游太虚，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似乎已不限于东欧，而是远及萨尔马罕、霍拉桑、塔什干或喀喇昆仑山。

第二天，我来到首都索非亚，穿过用废铁皮简单搭建的吉卜赛棚户区，走进摆着大号铜秤的牲口市场，这里好像聚集了所有从保加利亚西部贩卖来的牲口，马嘶驴鸣，不绝于耳。继续前行，身旁出现了巍峨宏伟的清真寺，高高的尖塔直插云霄。沿着电车铁轨，我走到了这座城市的中心。

要是是一直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肯定吃不消，不过如果只是当个匆匆过客，浮光掠影地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这座首都还是很有吸引力。城市建在山间的高地上，抬头就能望见维托沙山，阳光越过山峰，均匀地洒在大街小巷，让人有种神圣而肃然起敬的感觉，如同日本人见到心目中的神山富士山。沙皇鲍里斯<sup>[3]</sup>的宫殿门口，旗杆上的旗子在风中猎猎飘扬，代表保加利亚的狮子图案分外清晰。我依次经过国民议会大厦、国家剧院、花园、树林和保加利亚民族英雄的塑像，来到路面宽阔、绿树成荫的奥兹沃博迪特沙皇大道。这里是城市的中轴线，一座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sup>[4]</sup>的策马雕像巍然屹立，越过雕像的头顶，依稀可以望见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金色的圆顶和彩绘立柱。此时，太阳已经下山，空气

[3] 指鲍里斯三世（1894—1943），保加利亚沙皇，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三年在位。

[4]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他率军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放了保加利亚。

里稍微有了一丝凉爽。城里的居民都出了门，街上慢慢汇聚了不少人。从布达佩斯以东到比斯开湾以南，在黄昏时分出门溜达乘凉，仿佛是每个城里人的必修课。咖啡店里，侍者端出各式各样的土耳其风味咖啡，有学问的人们手里数着念珠，讨论着《莫斯科时报》上登载的头条新闻。街道像射出的子弹一样笔直，路旁点缀着小巧的民居，据说，索非亚的居民都是佩切涅格人的后裔。这个民族曾经是凶悍的游牧部落，世代居住在乌拉尔山脉，与东罗马帝国交战了数百年，最终定居于此，繁衍生息。

多亏瑞秋·弗洛伊德，那位在汽船上跟我分享西瓜的英国姑娘，把我从只住了一天的市场旁边的小旅舍里解救出来。驻索非亚的英国领事博伊德·托林顿与他的妻子朱迪斯·托林顿，慷慨地为我安排了住处。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能在异国他乡遇上英国人，用英语交谈，感到既兴奋又奇妙，就好像在国内遇上一群外国人，聊起天来很带劲。老家在英格兰中西部拉格比的主人，不停地向我讲述他在保加利亚的见闻。每天早上，用过早餐，我端着一杯格雷伯爵茶站在阳台上，注视着皇家卫队在奥兹沃博迪特沙皇大道上威武地行进。不限时供应的洗澡水，干净整洁的床单，身材魁梧的俄罗斯管家，视野开阔的露台，丰富的藏书，还可以远眺索非亚城的象征维托沙山脉，这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我找到主人私藏的《大英百科全书》，像猎豹一样猛扑了上去。想想旅途中的艰辛，简直令人不堪回首！那个夏天，拜占庭文化研究会正在索非亚召开年会，能亲耳聆听惠特莫尔教授<sup>[5]</sup>的真知灼见，领教专家们对索非亚大教堂的马赛克装饰艺术的高论，不啻为了一件幸事。我还遇上温文尔雅、穿着小山羊皮鞋、白色长衫和巴拿马草帽的罗

[5] 托马斯·惠特莫尔教授（1871—1950），美国考古学家、拜占庭文化学者，其最大成就是重新评价了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精美的马赛克镶嵌画艺术。

杰·辛克斯<sup>[6]</sup>与斯蒂芬·兰西曼<sup>[7]</sup>，两人性格各异，一位比较和善，不过待人接物时多少带点个人的偏见，另一位也还讨人喜欢，只是相处久了会觉得有些油腔滑调。那时，两人的代表作都还没怎么出版，印象中只有兰西曼的一本《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后来，我们还常常见面，但这两位学者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实在强烈，多年后，每次见到深色的玻璃杯子，我都能回忆起那个奇妙的咖啡馆之夜。

有那么几天，我偷偷告别这座都城的欢愉，跑到维托沙山的东面山坡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夜里，我住在斯莫诺沃的美国学院，这里设施完备，空气新鲜，图书馆藏书也很丰富。虽然放假了，还是有不少年轻人留了下来，为撰写论文加班加点。第二天，我翻山越岭前往多里·帕萨雷拉，天黑时才到达，借宿在一户好心的农家。摇摇晃晃的农舍建在村子中央，村民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喝着当地人喜欢的斯利沃酒，这种类似梅子白兰地的烈酒气味浓烈，尝一口就会上瘾。我和男主人蹒跚着走回家，他的妻子在柴火上煮了一锅土豆和小黄瓜，然后盛在共用的大盘子里。大家依次用勺子舀菜，然后盘腿围坐在一张矮圆桌旁，分享切成片的黑面包和白山羊奶酪。女主人将自己的长发编成辫子，用手帕扎紧。她腰间系着色彩斑斓的围裙，身穿红蓝相间的紧身上衣，衣服的下摆呈圆形，边沿有装饰用的穗带，看上去类似老式的晚宴礼服。衣袖仅到手肘部位，袖口除了镶有宽边，还有几英寸长的打褶蕾丝，虽然有些陈旧，依然富有美感。手工编织的地毯留着锯齿形的边沿，我大致数

---

[6] 罗杰·辛克斯（1903—1963），艺术历史学家，因参与清洗埃尔金石雕，对古迹造成破坏而备受争议。

[7] 斯蒂芬·兰西曼（1903—2000），历史学家，以研究拜占庭文化和十字军东征历史而闻名。

了数颜色，有紫色、黄色、红色和绿色，一直铺到墙角。除了我，全家人的穿戴都很整齐，扎着腰带，穿着鹿皮靴。互致晚安后不久，房间里就响起了鼾声，圣母玛利亚和隐士圣西门的圣像前面搁着一盏油灯，忽闪忽闪的火苗正徒劳地驱散步步紧逼的黑暗。夜半时分，我走到院子里，一不留神就被一团软软的东西绊了一跤，我擦了根火柴，亮光中，一头俯卧在地上的水牛正冲我怒目而视。

破晓之前，趁驴子还没有发出第一声嘶叫，我们就起床了。女主人端上土耳其咖啡、一小杯斯利沃酒、面包和白奶酪。男主人米尔科坚持不要我支付食宿费，一再摇头，嘴里不停重复着我听不懂的话。从巴尔干半岛到黎凡特盆地，当地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否定意见。带着主人的良好祝愿，我继续上路。村民们的盛情款待给了寂寞的行路人莫大的安慰。在穿越保加利亚的旅途中，我度过了不少这样的美妙夜晚。第二天傍晚，我来到小镇萨莫科夫，脚下的地形变得越来越陡峭崎岖，在夜幕的掩映下，里奥斯卡河山谷挺立在我面前。

第二天，我走进山里。和巴尔干山脉浑厚圆润的线条不同，这里都是锯齿状的山脊，形成蜿蜒幽深的峡谷，山坡上长满了冷杉和松树。沿着山脊艰难地攀登了好几个小时，眼前出现了并行山脉特有的拱壁，朝南方不断延伸。在山路以东，一两道山梁相互合拢、拔地而起，形成巴尔干半岛最高的山峰穆萨拉，而在山路以西，罗多彼山脉一路从保加利亚南部延伸至希腊东北，巨大的分水岭成为两国之间的天然屏障。最后，这条山脉进入土耳其位于欧洲的境内，山势也渐渐平坦。

顺着最近的一处分水岭，我来到一处山间的洼地。这里杳无人迹，估计只有狼和熊曾经有胆量从这里经过。雄鹰展开翅膀，在

峡谷间静静地盘旋。在岩石背风的一侧，偶尔还能看到残雪。干涸的河床上留下了零散的巨石，表明在冬天这里曾经涨过洪水。枯死的树木被烈日烤成了白色，看上去就像史前巨兽的骸骨。我的脚步声惊扰了一条在路上打盹的蛇，它扭动着长长的身子，钻进了路旁的百里香树丛。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一座岩壁下到另一座岩壁，掉落的碎石顺着岩石表面落进深谷，传来阵阵回声，最后归于沉寂。树木也从针叶林慢慢变成阔叶林，俯瞰着冰斗湖中湛蓝的天空。动物的足迹少了许多，林间出现一条人工开辟的小道，伐木工砍下的木屑表明这附近有了人烟。

拐过一个弯，透过枝叶的间隙，我看见林间有一块空地。一栋堡垒模样的建筑映入眼帘，还配有瞭望塔，俨然是座小城市，包围在浓密的山毛榉和松林中。堡垒南面的土墙紧挨着峡谷，五座高墙首尾相连，顶上铺了瓦，构成一个不规则的五面体。中间是深深的庭院和由半圆形拱门形成的围廊，庭院正中立着一座教堂，圆柱形的主塔上安放着金属穹顶，稀稀拉拉开着些窗户，周围环绕着副楼的小圆顶，在夕阳下反射着柔和的光。这一抹阳光照耀在教堂塔楼顶端的十字架上，将紫杉树的影子映在砂岩墙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洒进庭院里的光线越来越少，阴影最终占领了这片区域。突然，院子里响起一阵敲击声，好像乐师在用小槌有节奏地击打乐砧。敲击的速度逐渐加快，等我走进外堡的拱门，整个墙面都在震动。乐声骤然停止，只留下耳畔的嗡嗡声。一个穿着黑色袍子的修士用手里的小槌敲响了挂在围廊上的一张大锣。其他的修士也罩着黑袍，烟囱状的帽子下围着黑纱，依次走进教堂。里面已经聚集了不少身穿马其顿北部民族服装的村民，他们中有不少人风餐露宿来到此

地。要是没有大锣，有些教堂会用一根响木来代替，在大多数东正教修道院里，敲锣或者敲木头，就相当于敲响了钟声。圣·伊凡·里尔斯基修道院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圣约翰·里拉修道院在信徒们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圣西里尔和墨索迪乌斯修道院与圣西门修道院，前者是为了纪念西里尔字母的发明者，后者则位列保加利亚的圣徒传。这座建在距离其创始人隐修之地不远处的修道院，已经成为保加利亚人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历经动荡的岁月，修道院屡次被焚毁，又屡次重建，最近一次修缮完成于十九世纪末。几十年过去，内墙上的壁画和分割内殿的屏帔老旧了不少，在烛光下，颜色隐隐绰绰。晚祷仪式即将开始，身穿黑衣、留着长发和胡子的修士们或站立或依靠在各自的祈祷台上，嘴里念念有词。这样的祈祷会持续好几个小时。虽然修道院已经人满为患，但为了照顾我这个外来的访客，还是特地给我安排了一间过夜的小房间。而村民们就没有特殊待遇了，他们不得不铺上褙裯，睡在院子里或者树下。第二天，来修道院朝圣的人更多，每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修道院院长和他的随从身旁，站着大主教、主教和名誉院长，每个人都穿着精美的长袍，像甲虫的翅膀一样闪着金光。地位较高的教士头戴金色的法冠，手里握着牧杖。法冠如南瓜一般大小，镶嵌着熠熠生辉的宝石，牧杖的顶端雕着两条盘卷在一起的蛇。烟雾袅袅，吟诵祷文的声音高低起伏，仪式结束时，信徒们排成一列，绕场一圈，亲吻放在圣骨匣里的圣·伊凡雕像，尤其是他那只祛病除魔的手，也许是接受过太多人的亲吻，颜色和石南根一样黝黑。

完成了朝圣的大事，很多信徒聚在修道院外的空地上自娱自

乐。吉卜赛人用小提琴、鲁特琴、齐特琴和竖笛奏起欢快的音乐，人们围成一圈，不知疲倦地跳起霍拉舞曲。还有吉卜赛人带来一头熊，这只动物会跟着角笛的曲调展示笨拙的舞姿，还能跟着主人的鼓点摇动铃鼓。响板声从远处传来，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行商敲着黄铜杯子，从铜罐子上的水龙头里倒出一杯杯香甜的博萨酒<sup>[8]</sup>。罐子有四英尺高，形状像泰姬陵，顶部还立着一只展翅翱翔的铜制小鸟。烤肉架上，肉串和香肠在炉火上冒着香气，各色美味像伯劳鸟的巢穴一样丰富，人们喝着斯利沃酒，享用难得的佳肴，热烈的气氛就快达到顶点。醉得东倒西歪的村民向每个加入狂欢的人递上手中的木头雕花圆酒瓶。从喀尔巴阡山到品都斯山脉，对每个巴尔干半岛的山民来说，造型精巧的木头制品在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那里也有严酷的冬季、漫长的夜晚、取之不尽的软木和锋利的匕首。树荫下，一群系着围裙的女人坐在风笛手旁边，陶醉在动听的乐声中。

见识了这场巴尔干特色的盛宴，我走到人群边缘，与一群来自普罗夫迪夫的学生们攀谈。跟我一样，他们也翻山越岭而来，夜里还在荒郊露宿。最吸引我的，是一个满头金发、性格爽朗的漂亮姑娘。她叫娜代日达，在索非亚大学读法国文学专业。她跳起霍拉舞来摇曳生姿，火热的激情感染了身旁所有人。她准备在修道院待三天，潜心阅读随身带来的书籍，我们的日程安排正好一样，于是自然而然成了朋友。除了阿托斯圣山严禁女性前往，在大多数的东正教修道院，女性和男性访客一样，都可以自由迈入修道院的大门。乐善好施、泽被世人应该是修道院主要的功能之一，与西方基督教

---

[8] 博萨酒，产于保加利亚，一种由谷物和糖发酵而成的甜酒。



世界静穆而严苛的隐修院相比，这里的氛围要轻松欢快得多。耳畔传来清脆的脚步声，信徒们来来往往，修士们兴致高昂，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中世纪时期安居乐业的城邦。支撑回廊与步道的木板破旧不堪，仿佛一阵风刮来，就能像柔弱的蛛网一样土崩瓦解。骡子是庭院里的常客。修道院院长奥特兹·伊戈曼神父待人和善，白色的胡须一看就透着威严，为了接待数量众多的信徒，他可没少操心。当然，从多瑙河南岸赶来的村民也会送来不少土特产，比如冰冻果子露、玫瑰花瓣酱、斯利沃酒或土耳其咖啡，以答谢修道院的款待。

第二天，修道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在歌舞狂欢和美梦酣睡之后，信徒们打点行装，带着宿醉，一步三摇地下山去了。

娜代日达是我旅途中的良好伴侣。每天早上，我们带着图书和画本，去修道院墙外的小摊买些奶酪、面包、红酒、绿紫色的无花果和装在篮子里的新鲜葡萄，然后出发去附近的小树林，途中还能经过博切尔<sup>[9]</sup>的墓园。这位曾经在伊顿公学任教的老师和《泰晤士报》记者，在全体保加利亚人心中博得了一席之地，如同希腊人对拜伦满怀崇敬之情一样。我们一起读书、讨论，饿了就找个树荫大快朵颐。娜代日达要完成的功课是背诵浪漫派大师拉马丁的诗歌《湖》。“他曾经住在普罗夫迪夫，”她告诉我，“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他住过的地方。”还有一首西奥多·德·邦维尔的诗也是学习内容，标题听上去有些不应景，叫《我们不再去森林》。我一遍遍听她背诵，纠正其中的错误。有时她会把书抢过去，然后戴上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仔细阅读那些拗口的字句，脸上的表情时而兴奋、时而懊恼。学习果然是件乏味的事儿，还不如爬树有趣，

[9] 詹姆斯·大卫·博切尔（1850—1920），多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巴尔干半岛记者，并公开声援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